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that Different Ways of Thought have on
Language Learning:
Taking the Russian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for Example
L'influence des différences de façon de penser sur l'apprentissage
linguistique**

思維方式差異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以俄漢語言為例

Li Fayuan

李發元

Received 9 April 2007; accepted 20 June 2007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from exploring such differences in ways of thought of the Russian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between integer-first and part-first, helical and linear thought, different sequence of time and space, form-oriented and meaning-oriented thought, precision-first and ambiguity-first and subjectivity-focus and objectivity-focus way of thought,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ce the above differences have on the ways of thought of the Russian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on their languages.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that different ways of thought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have on Russian Learning

Key words: way of thought, difference, influence, the Russian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Résumé: L'article présent étudie l'influence des différences de façon de penser des Russes et des Chinois sur leur langue respective et leur expression, et sur l'apprentissage du russe, sous les six angles suivants : ensemble en priorité et partie en priorité ; spirale et linéaire ; ordre temporel et ordre spatial, cohésion par forme et cohésion par sens ; exact et vague, sujet et objet.

Mots-clés: façon de penser, différence, influence, le russe et le chinois

摘要: 本文從整體優先與局部優先思維方式差異；螺旋性與直線性思維方式差異；時空順序思維方式差異；形意合思維方式差異；精確與模糊思維方式差異；主客體思維方式差異等六個方面探討了俄漢民族思維方式的差異對俄漢語言及其表達方式的影響，以及俄漢思維差異對俄語學習的影響。

關鍵詞: 思維方式；差異；影響；俄漢語言

思維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的過程。所謂思維方式可以指長久穩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維方法、思維習慣、對待事物的審視趨向的公眾認同的觀點。“從認識論的角度，可以把思維方式看作是人的認識定勢和認識運行模式的總和。”（陳中立

1990：27）也可以說，思維方式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區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思維習慣或思維的程序，是人類文化現象的深層本質，屬於文化現象背後的，對人類文化行為起支配作用的穩定因素。思維方式具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實踐性，思維方式的形成以實踐活動為

基礎；二是歷史性，一種思維方式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受歷史條件、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等歷史因素的制約；三是相對穩定性，思維方式一旦在主體思維結構中固定下來，就會相對穩定，在發展中有繼承。

從另一個角度看，人類的思維活動是靠詞、詞組、句子和句群等語言形式表達的，因此，思維方式和語言形式有著密切的聯繫。思維離不開語言，並且支配著語言，而語言是思維的主要載體，也是思維的主要表現形式。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語言結構，所以要真正獲得某種語言能力，熟練地掌握該語言，關鍵不僅僅在於掌握該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匯，還在於對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思維方式的了解。俄漢兩種語言是在截然不同的社會、歷史傳統和生活中逐漸形成的，使用這兩種語言的人在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方面自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地方。

譬如，寫作是學習任何一門語言時必須掌握，但又並非輕易所能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長期的俄語教學實踐證明，要提高寫作能力，除了具有堅實的俄語基本功外，還要特別重視俄漢民族文化思維差異這一重要因素。仔細研析歷年我國大學俄語四、六級和專業四、八級俄語作文，我們發現，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詞不達意、語言幹癟、語序混亂、連貫性差、漢語句式、段落銜接紊亂，等等。這些問題除了語法、詞匯因素外，因思維方式差異而造成的思維負遷移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俄漢兩種語言分別屬於斯拉夫語系和漢藏語系，二者在語法、搭配、銜接手段、語篇組織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而語言表達者一般習慣於漢語思維，結果在寫作時受到母語思維方式的影響，出現了許多中式俄語（*китаизм*）。而在俄語寫作教學中我們的教師習慣於花很多精力修改作文中表層的語言錯誤，但未能從更深層次的文化思維方式方面加以分析、糾正，其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本文將探討俄漢思維的特點及其差異對俄語學習的影響。

1. 整體優先與局部優先思維方式差異

整體思維是指在思想上將對象的各個部分聯合為整體，將它的各種屬性、方面、聯系等結合起來；局部優先思維是指在思想上將一個完整的對象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或者將它的各種屬

性、方面、聯系等區分開來。漢民族思維方式以整體性為基點把事物作為有機整體，進行籠統的直覺綜合，習慣於直覺的整體性與和諧的辨證性，習慣於從世界或事物的總體出發，強調事物的相互聯系和整體功能，注重思考錯綜複雜的整體事物及其過程與關係，而不注重事物的內部結構，不作具體的分析，這種分析的整體綜合，只能是直覺意義上的綜合，而俄民族的思維方式以邏輯、分析、線性為特點，以個體性為基點，把複雜的事物分解成簡單的要素，逐個地進行研究，這就導致了思維上部分優先的特點。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支配下，俄國人對自然界分門別類地研究，這樣可以把隱藏在整體中的重要細節找出來，透過複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

中國人受其整體思維方式的影響，“凡事習慣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先全面考慮，之後縮小思路，考慮細節。而西方人（包括俄羅斯人，下同）則從具體或局部到整體，這是一種解析式的思維方式，一種由點到線，以線式為主體的線式思維方式。”（賈玉新 1997：98-100）漢民族的整體思維方式在漢語的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譬如，漢語一些雙音詞的組合次序也是從大到小，如國家、大小、多少、長短、寬窄、高矮、年月、分秒等。再如，中國人的姓名中先是宗姓、輩分，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的整體。這和中國傳統思維中注重整體性的特征是分不開的。而俄國人則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後才是族姓，突出的是個體，是一種個人主義取向。這種注重整體性的思維方式還表現在對被動語態的使用中，漢語沒有硬性規定採取主、被動形式，因為中國文化傾向於以觀察的態度對待自然，從自己出發，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手去感覺，這樣的模式是單向而不可逆轉的。而俄國人則採用概念化模式來對待自然，所以用動作的實施者和承受者來作主語都是合理的，被動語態的使用還體現了俄國人重客觀，講實證的特點，尤其在說理性文章當中。

由於漢語思維是一種整體優先的認識活動，所以中國學生思維時往往以整個圖像為起點，是“整體思維學習者”，寫論文喜歡選擇大題目；而俄國人思維時往往以個別部分為起點，然後再把這些部分拼合為一個整體，是“解析式的學習者”。俄國學生的論文選題一般比較具體，這是兩種文化思維特點的一種反映。因此，我們的學生

用俄語寫作和翻譯時，還是跟用漢語時一樣，先考慮整體，後考慮局部，以致中國學生寫出的俄語作文，無論構思、謀篇布局，還是遣詞造句、句法結構都不符合俄語的特點，有漢式俄語之嫌，這可視之為寫作中的負遷移。

2. 螺旋性與直線性思維方式差異

漢俄民族由於受不同的地理環境、文化淵源的影響，導致了另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漢民族的思維方式是螺旋型，即指作者不直接論證段落主題，而是在主題外圍“團團轉”，從各種間接角度來說明問題。在談論某個問題時，不是採取直線式或直接切題的作法，總是一個由次要到主要，由背景到任務，從相關信息到話題的發展過程，往往把諸如對別人的要求和意見以及自己的看法等主要內容或關鍵問題保留到最後或含而不露。同時，中國人受玄學和政治高壓及文字獄的影響，特別是宗教文化，像佛文化的悟、禪，導致語言表述的不連貫、含糊，處處顯現似是而非的禪機；道家的無為和飄逸，導致語言的輕盈、跨度大、好比喻，令語言表意難以捉摸等。這些思維特點使得用漢語表達某一主題(或思想)時具有跳躍性和左右回旋性，習慣於從側面說明或闡明外在因素後，再點出中心，不太重視形式邏輯，表現形式受意念引導，趨於含蓄和靈活，需要較多的意會和感悟。凱普蘭(Robert Kaplan)運用對比修辭方法研究不同文化、思維方式對語篇的組織形式的影響時指出，東方語言(尤指漢語和朝鮮語)語篇的特征是其“間接性”，語篇組織模式多為螺旋型，語篇的發展往往採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了當地闡述主題，而是以一種螺旋式的反復暗示逐步引出主題。因此，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直覺、具體和圓式為特征。他們說話、寫文章也往往表現出把思想發散出去還要收攏回來，落到原來的起點上，這就使其話語或語篇結構呈圓式，或呈聚集式”。(賈玉新 1997: 391)

而俄民族則是另一種特殊型思維方式——直線型，在思維過程中主要借助於抽象概念，遵循三段論的形式，常常採取演繹的方法即由一般至特殊，並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其主要特點為：先概括、後細節；先抽象、後具體；先綜合、後分析，結構主要呈線性發展。在俄語寫作上則表

現為注重實證、多理性、多科學的邏輯推理，用事實來說明問題，他們談話寫文章習慣直接點題、態度明確、不講廢話，把話題放在最前面，以引起聽話人或讀者的重視。正如徐念慈先生所描述的，這是一種逆潮式，其特點是“起筆多突兀，結筆多灑脫”，與此相對應的俄語篇章結構主要呈直線型發展，它往往先陳述段落的中心意思，而後分點說明，非常注重主題句的明確設定，把自己談論的觀點在主題句中提出來，然後一步一步論證。由主題句直接向縱深方向拓進，所謂主題句是段落最重要的句子，主要用來表明段落或章節的中心思想，通常出現在段首位置。請看例證：

Философ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есть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й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Европы ...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оказал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й философией, верной всем
учения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враждебной
суевериям, ханжеству и т. п. \ Ленин\

上例的第一句話是該段的主題句，它是該段的語義中心，為以後的敘述定下基調，其它句子在結構和語義都依賴於該主題句。

受母語影響，絕大多數中國學生在用俄語寫作時往往習慣於先用漢語構思，然後再把自己的意思譯成俄語，套用中文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手法進行寫作，經常忽視主題句的設定及其在句首位置，很少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期待讀者通過對段落或語篇的整體把握去理解作者的意圖。因此，中國學生的俄語作文往往被認為“重點不突出”和“結構混亂”，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所使用的修辭順序，或思維順序不同於俄語本族語者。

3. 時空順序思維方式差異

中國人追求的是和諧統一的整體思維，他們感知世界是與自然完全合拍的，即處於與自然統一的整體結構中，有一種內在的時間順序邏輯。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漢語的習慣是按時間順序和事理邏輯順序組織句篇，先發生的事先說，後發生的事後說，先原因後結果。而俄民族的思維方式正好相反，受其思維方式的影響，俄語句子靠形合機制，可以通過各種連接詞或關係詞將

先發生的事後說，將後發生的事先說，可先說結果，後說原因。中國學生受其思維模式的影響，按照漢語的習慣組織句子結構。在用俄語表達時間、原因、結果等關係的句子或短語時，往往採用中式的思維順序，總是把表示時間、目的、條件、地點、比較、原因的短語前置，導致中心意思不突出，因為在漢語中一般將充當狀語的句子和短語往往置於句首或謂語動詞之前，但在俄語中往往後置(在動詞之後，或整個句子之後)。

就語言本身來講，這種思維模式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漢語的語法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詞序相對固定，主、謂、賓、定、狀、補不能隨意調換。而俄語相比較而言則要靈活得多，可通過形態變化改變詞性，更改詞序，靈活組句。另外，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俄語本族語者往往先表達自己的感受，而後敘說事由。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俄語句子的突出特點是空間搭架形式，以主語和謂語兩大支柱為核心控制句內其他各種成分(如各種短語、從句等)，其它修飾、限制、補充等附加成份好似主幹上的旁支，借助各種關聯詞進行空間搭架，構成一種樹型結構。而漢語句子則沒有一定的主謂框架限制，以動詞為中心，以時間(先後)邏輯事理為順序，可能有幾個結構動詞連用，或幾個名詞性短語連續鋪排，節奏簡潔明快。“這說明漢語的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間構架的嚴整，而是線形的流動、轉折，追求流動的韻律、節奏、不滯於形，而是以意統形，自上而下是一個形散意合的系統。有人形容漢語造句‘如大江流水，後浪推前浪’，俄語則‘如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王秉欽教授曾分析過這樣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句：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ортретов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ередать тог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собой одар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ое быстро шло на смену первым впечатлениям от его простой внешности, как только вы начин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в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 его облик.

“這是一個典型的由主到次、由一到多、句中成分遞相疊加的句子。它按照俄國人的思維方式從前到後遞次展開，順勢而下，而譯成漢語，照此順譯則行不通，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從後向前逆譯，才能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所接受，才符合事理邏輯”。試比較：“只有稍微細看一下，你從佛拉基米爾·伊裏奇的樸實外表得來的最初印

象會馬上消失，隨之而來的就是你對他的特殊天賦的印象，而佛拉基米爾·伊裏奇的許多肖像都沒有能夠表達出這種特殊天賦的印象。”(王秉欽 1995: 15)

由此可見，俄語句子雖然看起來繁瑣累贅，實際上則是通過嚴整的結構表達出一種中心明確、層次清楚的邏輯意念。而漢語句子主要是連動句和流水句，不是突出以說明主語的謂語動詞為中心，而是按時間先後順序的客觀事理的推移。

4. 形意合思維方式差異

從文化、思維與語言關係上看，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思維模式必然在其載體——語言上得以反映，也在語言的巨大作用下得以模化、固化。俄國人主要運用判斷、推理等抽象性思維，它以各個部分為起點，拼合出一個整體，主張“人物分離”，重形式論證，崇尚個體思維。反映在俄語語言上，則重形合。而漢語思維重悟性、直覺，這使得俄漢兩種語言在句式結構上的最大區別在於俄語重形合，而漢語重意合。在漢語語句中隱去主語是司空見慣的，而俄語則相反。誠如王力先生所言：“西洋的語法通則是需求每一個句子有一個主語的，沒有主語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國的語法通則是，凡主語顯然可知的，以不用為常例，故沒有主語卻是常例，是隱去，不是省略。”(王力 1984: 52-53)如“我們明天下午有講座”，“我們”是“話題”，“明天下午有講座”是“說明”。根據漢語的“意合法”，我們只說，“明天下午有講座”即可，如將“話題”(我們)留著，倒反顯得不自然。又如，“中國習俗與其他國家不一樣”，“(中國)習俗”是“話題 1”，“與……不一樣”是“說明”，“(其他國家的)習俗”是“話題 2”，對於採用“意合法”的漢語，省去“話題 2”，圖像依然非常清晰，不省去，反而顯得羅嗦；而“形合法”的俄語，不管省略哪一個“話題”，都難以形成一個合乎邏輯的整體。我們的學生經常在他們的俄語作文和翻譯中省去“話題”，即“主語”，使語義、邏輯混亂，不知所雲。試比較：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豐神迥異。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於石邊高談快論。(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

譯文： Однажды в момент отчаяния чудесный камень неожиданно увидел двух приближающих к нему монахов, ----- одного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другого даоского, с необычной внешностью и манерами. Они подошли к подножью хребта Цингэн, опустились на землю и стали беседовать.

儘管漢語“正當嗟悼之際”是個無主句，但讀者根據上下文意會到是那塊被女媧補天時所遺棄的石塊在“嗟悼”，這在俄語中非但無法行文，且讀者會不知所雲，所以譯文加上了主語“чудесный камень”方一目了然。接著一下子又轉到了“說說笑笑來至峰下”，究竟是何人在“說說笑笑來至峰下？”，漢語依靠語境不難看出邏輯主語就是上文中的那“一僧一道”。而俄語只有加上主語“они”才使得語義清晰，過度自然。因此，俄語主要靠“形合”的句法結構，如果省略了主語，則語義含混。俄語句法是建立在“主語—謂語”這一語法結構框架上的，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主語（或主體）、一個謂語；而漢語表達主要靠意合，它的句法結構主要是“話題—說明”框架，在上下文清楚的情況下通常省略主語。

俄語造句常用各種形式手段、連接詞語（如 кто、что、когда、где、куда 等關聯詞，и、но、а 等連接詞），注重顯性銜接，注重句子形式，注重結構完整，注重以形統神，以形顯義，還可以用形態變化形式、前後照應等其它手段，把各種成分連接起來，構成長短句子，表達一定的語法關係、邏輯關係。這種通過嚴謹的結構和緊密的銜接手段來表達嚴謹的思想和系統性概念的方式說明俄語重形合。而漢民族的思維具有含蓄、委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正是這種思維方式釀成了漢語“尚意合，以意馭形”的語法特征。體現在寫作上，漢語用詞傾向以實的形式表達虛的概念，以具體的形象表達抽象的內容，不強求語言形式，少用連詞，多無主句，少被動語態句，行文求全面，不怕重複，詞句求平衡與對稱。例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兵法》）。句中只用了一個連詞“而”，不用加上以下括號中的連詞，因果關係已很明確了，如：（若）知彼（而又）知己，（則）百戰不殆；（若）不知彼而知己，（則）（將）一勝一負；（若）不知彼（且）不知己，（則）每戰必殆。誠如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所言：“……

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轉引自陳定安 2000：37）。因此，漢語常用散句、短句來表達一定的意念。由於線型結構靈活流暢，所以漢語的句與句之間沒有過多的“粘合劑”，不用任何連接符號，而靠語義上的聯系結合在一起。

在未熟練掌握俄語語句的內在規律時，中國學生會不知不覺地在俄語寫作中受到意合方式的誤導：缺少或誤用起紐帶作用的詞或詞組，寫作中充斥著簡單句和短句。試比較：

Увидев этот почерк и штемпель, Нехлюдов покраснел и тот час же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тот подъем энергии, который он всегда испытывал при приближении опасности. \ Толстой \

在這個句子的組合中，作者利用俄語句子形態豐滿，多形合的特點，使用了副動詞、定語從句、連接詞等，句與句之間銜接十分緊密，構成一個完整的意義整體。如果將這樣的句組翻譯成漢語，就不能照搬俄語的銜接模式，譯文應盡量符合漢語句子的銜接習慣，即隱形的意義銜接，變形合為意合，試比較：

聶赫留朵夫一見到他的筆跡和郵戳，就滿臉通紅，頓時感到精神緊張起來。他每遇到危險，總是這樣的。

從譯文可以看出，漢語句子與句子之間是靠意義的內在銜接，形成一種隱含的意義脈絡，即靠動作的時間先後和邏輯關係組句，而不要（或少用）連接詞等形合手段。因此，漢語句子意連形不連，俄語句子則以形連表意連。由於俄語在組篇時有許多的粘和詞（如連詞）；漢語句子是靈活流暢的線型結構，句段之間可以不用連接符號，而靠語義上的聯系結合在一起。受漢語這種“無形態語言”和整體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學生在俄語表達時往往缺乏形態變化，缺乏複雜句法結構。

就俄漢語言的特點來看，俄語的屈折形態變化非常豐富，是屬於有標記的語言（如名詞單複數、各種動詞時態、語態等等）。俄語句法結構完備，體現了俄羅斯人解析式的抽象思維，具有嚴格的形式邏輯；而漢語“不像俄語言的句子那樣以動詞為中心搭起固定框架，以‘形’役‘意’，而是以意義的完整為目的，用一個個語言板塊按邏輯事

理的流動、鋪排的局勢來完成內容表達的要求”，因此其字、詞使用靈活，屬於缺少屈折形態變化的無標記語言，沒有嚴格的形態制約，句法結構松散，屬於整體式的思維方式。語言學家王力教授在其《中國語法論》中談到中西語法的差別時說：“西洋語法是硬的，沒有彈性；而中國語法是軟的，有彈性的……惟其軟的，所以中國語法以達意為主。”而俄語傾向於使用表達同類事物的整體詞來表達具體事物或現象，用詞傾向於虛，大量使用抽象名詞和前置詞，尤其在現代俄語中，出現了前置詞短語替代動詞、形容詞、甚至一些語法結構的現象。

5. 精確與模糊思維方式差異

模糊性，即不重邏輯分析而用概括模糊方式感知認知對象。中國人在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上，擅長從經驗出發，在對對象由此及彼的推斷中把歷史的、現實的經驗作為思考的重要參照系數，以“感悟”的形式去尋求對象的本質與規律性，以期對對象做出可能或必然的把握。這種直覺思維方式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濃厚的模糊特征，即對對象的認識有一定的模糊性，忽視細節與成份分析，忽略“量”的把握而片面強調對對象的整體結構的“質”的把握。這一特征也反映在概念模糊，界說不清，嚴複以“好訓詁”來評價這一點。概念不明確，就會使思維陷入混亂，就不會有線索清晰的理論體系。而對西方人來說，對對象的認識要求絕對精確，要求以確定的方式表達，反對模稜兩可，追求表述上的準確、判斷的恰當和推理的嚴密。（李明 2004：38）因此西方人重實際、重科學，思維方式比較嚴密，他們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思考，從已知推導未知，然後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同一意思，中西哲人表達風格各異。如老子說：“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想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也。”（簡本《老子》每二篇第九章。）類似的意思想赫拉克利特卻變成了“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孔子對智慧的定義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

政》）。亞裏士多德卻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馬全智 1995：37）

這種思維方式反映在語言上，在漢語中，名詞沒有單複數形式的區別；動詞沒有人稱、時態的變化；主語與謂語之間的關聯形式不受人稱、格、數量、時間等的嚴格限制；對施事和受事的關係也不如俄語精確，而這一切都與模糊性這一中國傳統思維的重要特征密不可分。模糊數學的創始人查德指出：古代東方思辯方式與模糊數學有近似的邏輯基礎，“他們的邏輯不像西方的笛卡爾邏輯”，“更多地接受既不是真，又不是非常假的真值，這正是印度、中國、日本文化的特征”（查德，1984）。因此，學生儘管掌握了一定的語法知識，但到具體應用時，又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常會犯錯誤，因為俄語受西方文化及思維方式的影響，詞的形式和組詞成句的規律與漢語相比有明顯的差異。

6. 主客體思維方式差異

中國傳統思想，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基本是一致的，而西方不同，希臘哲學，很早就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東方人認為人類最高的智慧體現在對“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與人鬥爭”能力的大小；西方人認為人類最高的智慧體現在對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與自然鬥爭”能力的大小，這種主體和客體思維角度的習慣性的差異在語言上也有反映，如漢語重人稱，俄語重物稱；漢語常用主動式，俄語常用被動式；漢語語氣主觀、強硬，俄語語氣客觀、委婉等。漢語中常用一定概念的“人”作主語，而俄語則用一些抽象概念的詞作主語。中國的俄語學習者極易受這種思維差異影響，在俄漢互譯時會不知不覺的錯用主客體。試比較：

Но сознание возросше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морального долга в условиях нынешн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роли науки в обществе, полных напряженных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охватыв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е круги ученых.（主語是表抽象意義的名詞 сознание）

譯文：但是，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識到，根據目前科學在社會中所處的狀況和所起的作用，

在充滿著尖銳的辨證矛盾的條件下，社會責任和本身的道德義務都在不斷增加。（主語是名詞“科學家”）

По дороге их захватила метель. \ Чехов \ (主語是抽象名詞 метель)

譯文：在路上，他們碰上一場大風雪。（主語是代詞“他們”）

漢俄語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在用俄語作文或俄漢互譯時應根據俄漢民族不同的思維習慣進行主、客體的調整和轉換，這樣的譯文才能為兩民族的文化心理所接受。

參考文獻

- [1] 崔清田. 邏輯與文化. 人大複印資料. **邏輯**[J]. 2002 年第 1 期.
- [2] 陳中立. **思維方式與社會發展**[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
- [3] 賈玉新. **跨文化交際學**[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7.

[4] 王秉欽. **文化翻譯學**[M].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5.

[5] 彭娜. 論文化差異對寫作思維的影響[J]. **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 1999.

[6] 郭建中. **文化與翻譯**[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2.

[7] 李明. 從數學精神與邏輯特征看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J]. **邏輯**, 2004 年第 3 期.

[8] 馬全智. 《易經》思維概括[J]. **思維與智慧**, 1995.

[9] 陳定安. **俄漢比較與翻譯**[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0.

[10] 王力. **王力文集(第一卷)**[M].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4.

作者簡介

Li Fayuan (李發元), 男 (1962---), 漢族, 中國甘肅蘭州人, 蘭州大學教授, 文學碩士, 研究方向為中外文化與語言比較。

通訊地址: Lan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Gansu, Lanzhou, 730000, P.R. of China. 中國甘肅省蘭州市, 蘭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730000.

E-mail: lify@lzu.edu.cn